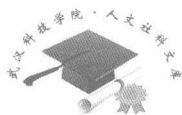




◆ 李和山 著

王先谦学术年谱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王先谦学术年谱

◆李和山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先谦学术年谱/李和山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4

ISBN 978 - 7 - 216 - 05925 - 1

I. 王…

II. 李…

III. 王先谦(1842 ~ 1917) — 年谱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8311 号

武汉科技学院·人文社科文库

王先谦学术年谱

李和山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市洪林印务有限公司

印张:18.5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插页:1

版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48 千字

定价:36.00 元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925 - 1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总 序

在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中,人文社会学科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一所以工科为主的高校来说,人文社会学科的建设则具有特殊的意义。人文社会科学具有积累知识、传承文明、创新理论、服务社会的功能,能为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指导,调节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以及根据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运行机制提供程序系统。自然科学技术只有与人文社会科学结合起来,才能在现代社会发挥整体的强大功能。因此,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是高校特别是以工科为主的高校不断提升办学水平的一个重要条件。

武汉科技学院是一所以工科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普通高等学校。在过去五十年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纺织服装特色与优势。在新的历史时期,围绕现有特色与优势,促进学科交叉,形成多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学科建设格局,是进一步壮大特色与优势,促进特色的高水平发展的必然选择。我校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一支具有较强实力的学科队伍,承担了一批高层次的科研项目,产出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人文社会学科建设突出了学科交叉,围绕学校的特色形成自身优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彰显学校的办学特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以丛书形式出版“人文社科文库”,旨在展示我校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文库的选题涉及哲学、政治学、文学、教育学、管理学、法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关注社会现实,跟踪学术前沿,追求学术创新,是这套文库的一个重要特点。文库的作者都是我校人



文社科学院近年来引进和培养的博士。他们朝气蓬勃,思想活跃,潜心于学术,敢于迎接挑战,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敢于创新,既有理论上的突破,又有方法上的创新,如引进数学模型阐述理论、运用经济学分析论证哲学问题等,显示出扎实的学术功底,学术成果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反映了我校人文社科学院的研究实力。必须指出的是,文库大多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修改而成的,虽有名师指导,历经反复推敲修改,达到了一定的学术水平,但其中也难免学术视野、学术方法、学术经验等方面的局限性。因此,这套文库的出版重在为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学者提供一个交流和展示研究成果的平台。

学校高度重视文库的出版,并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全额资助。但文库的出版只是一个出发点,希望这套文库的出版能够在学校人文社会学科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使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校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武汉科技学院院长 张建国
2009年3月



序

从晚清开始,中国就被逼步入了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当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之后,颠沛的统治者也终于明白,必须利用西方的枪炮之利方能有自己立足之地,而要利用西方枪炮之利,就必须在物质生产的层面上学习西方,走上近代化。甲午惨败后,有识之士也终于明白,仅仅有物质层面的变革是不够的,必须还有政治体制上的变革,于是有了改良,改良失败而有了革命。然而革命之后,社会依然黑暗,先知先觉们也终于明白,还必须有个思想上的解放运动,于是有了“五四”。“五四”是以启蒙为主题的,但其导火线是救亡。在外患频仍的情形下,自然就变奏为救亡,启蒙搁置一边。救亡之后,面临的是崛起,以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崛起,已成为自觉的意识。崛起之与启蒙,是否能相伴而行,而不再成为变奏,这就要看历史如何选择了。

在晚清迄今一百七十年的历史过程中,尽管中国的近代化远未完成,但中国的学术版图却早已被西方的学术体系所完全颠覆,彻底改写。我们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汉代还有六部分类法)在现代学术面前局促不安,难以招架,终于只能退到一隅。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传统的学科分类法,自然科学的著作仅仅是子部中的一小类,而且有的还和迷信之书混在一起。而近代化的特色就是近代科学的兴起,科学技术成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这方面的著作铺天盖地而来,蔚成大国,四部分类的框架自然难以胜任。既然此“中体”已不中用,西方的学术体系便堂皇而入。时至今日,我们的学科分类法,不和西方接轨的,已经很少很少了。晚清民初,一些学者提倡“国学”,便是想在这个中国学术版图被改写的不可阻遏的洪流中发出一些惹人注意的呐喊,为传统的经学、小学争取一点可怜的空间,为中华民族争取一点学术上的话语权。晚清民国间的中西文化



交流和碰撞,在我方当然难免有屈辱之感,但却产生了好些至今依然星光闪烁的学术大师。这些大师是在波谲云诡的学术流变中自然形成的,不是政府所封。国家贫弱,科技落后,学术版图被改写,却产生迄今辉照我们的学术界的大师,真是吊诡!也许是皇权的疲软,让这些学殖丰厚的学人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下放胆言说,从而焕发出异彩。

王先谦,就是生活在中国被逼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开始阶段,他是如何回应这个时代的呼唤的?是完全的守旧,还是有些因应的改变?

王先谦,就是生活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版图即将隐退,中国传统学问到了全部要归总的时代,他持什么态度,有哪些作为?

王先谦本人当然不可能看得到时代发展的轨迹,也不可能明白他处在中国步入近代化的开头,他自然是以传统的儒者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上。但是,时代的巨变,不能不对他产生巨大的冲击,他必须思考,他必须回应,他必须笔耕。从政治上来看,他守旧的成分更多。从学术上看,他和乾嘉诸老相比,也许算不上高明的考据学家,但就文献的搜集和整理而言,却可以说晚清罕有其匹。其门庭之广大,治学之勤苦,著作之宏富,不能不令人赞叹。谓之卓然成立,俨然大家,亦非言过其实。更不必说环顾今日的学术界,其治学的广度和深度,无人能匹了。

假如有年轻俊彦,有志于晚清民国间的学术史,则王先谦其人,是绕不过去的。将其置于上述的时代变迁中来考察,也是势所必然。

2004年,李和山君来与我共学。其硕士导师鲁毅先生,是我的好友。鉴于李君的学力,鲁毅先生以为以研究王先谦的学术履历为佳,并出“王先谦学术年谱”的题目,我也以为此题对李君比较合适。李君遂致力于此,经数载寒暑,终于成此论文。其订正王氏自定年谱之处,纠正世人误解之事,斑斑在是,均甚可观。自然,如果仔细细读典籍,深入爬梳史实,阐释其思想,论列其行事,在此基础上而成王先谦之评传,则尚有待于来者。李君其有意乎?

是为序。

王继如

2009年3月4日于三学堂



目 录

序	1
引 言	1
家世传略	18
正 谱	23
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 年)	23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 年)	24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 年)	24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 年)	25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 年)	25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 年)	25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 年)	26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 年)	26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 年)	26
文宗咸丰元年辛亥(1851 年)	27
咸丰二年壬子(1852 年)	28
咸丰三年癸丑(1853 年)	29
咸丰四年甲寅(1854 年)	29
咸丰五年乙卯(1855 年)	30
咸丰六年丙辰(1856 年)	30
咸丰七年丁巳(1857 年)	30
咸丰八年戊午(1858 年)	32



咸丰九年己未(1859 年)	32
咸丰十年庚申(1860 年)	33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 年)	33
穆宗同治元年壬戌(1862 年)	36
同治二年癸亥(1863 年)	38
同治三年甲子(1864 年)	40
同治四年乙丑(1865 年)	42
同治五年丙寅(1866 年)	43
同治六年丁卯(1867 年)	45
同治七年戊辰(1868 年)	46
同治八年己巳(1869 年)	49
同治九年庚午(1870 年)	51
同治十年辛未(1871 年)	53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 年)	55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 年)	58
同治十三年申戌(1874 年)	59
德宗光绪元年乙亥(1875 年)	62
光绪二年丙子(1876 年)	66
光绪三年丁丑(1877 年)	69
光绪四年戊寅(1878 年)	70
光绪五年己卯(1879 年)	71
光绪六年庚辰(1880 年)	80
光绪七年辛巳(1881 年)	88
光绪八年壬午(1882 年)	100
光绪九年癸未(1883 年)	104
光绪十年甲申(1884 年)	107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 年)	112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 年)	116
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 年)	123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 年)	129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 年)	137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 年)	142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 年)	146
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 年)	154
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 年)	159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 年)	163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 年)	164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 年)	169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 年)	173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 年)	176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 年)	193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 年)	195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 年)	202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 年)	209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 年)	212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 年)	215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 年)	220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 年)	225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 年)	228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 年)	232
宣统元年己酉(1909 年)	233
宣统二年庚戌(1910 年)	239
宣统三年辛亥(1911 年)	245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1912 年)	248



民国二年癸丑(1913 年)	249
民国三年甲寅(1914 年)	253
民国四年乙卯(1915 年)	255
民国五年丙辰(1916 年)	260
民国六年丁巳(1917 年)	261
参考文献	281
后 记	287



引言

王先谦,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生。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选庶吉士。七年散馆授编修,累迁至翰林院侍讲、侍读。历典云南、江西、浙江乡试,两充会试同考官。光绪六年(1880年)升补国子监祭酒。十一年出任江苏学政。十四年任满开缺还湘,先后主讲思贤讲舍及城南、岳麓两书院。后兼任湖南师范馆馆长、学务公所议长、自治筹办处会办等职。三十四年,由湘抚岑春煊进呈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汉书补注》等四种著述,朝廷赏内阁学士衔。宣统二年(1910年),因长沙“抢米风潮”一案,被两湖总督瑞澂劾奏免职。辛亥革命后,改署名遜,常隐居乡野,闭门著书。民国六年十一月(1918年1月)卒于家,终年76岁。

他早期在朝为官,留心时务,讲求实效,针砭时弊,直言敢谏,颇有贤声;中年出任江苏学政,以经术造士,延通儒主讲南菁书院,成就人才甚多;回湘后主讲书院,一依在苏教士之法。甲午中国战败,他痛感国家贫弱、民生艰难,颇思强国富民之计。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联合湘绅张祖同、熊希龄等人,创立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先后筹办火柴公司、内河行轮、发电厂等实业,积极发展近代工商业。为了培养通晓制造的人材,又领衔请开时务学堂,并率先在岳麓书院进行课程改革,成为早期湖南新政的积极参与者,在湖南近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倡导和推进作用。但戊戌年间,他却领衔向湘抚递呈《湘绅公呈》,反对康、梁学说,攻击时务学堂,因此而长期饱受非议,被人们视为破坏湖南新政的“顽固派”、“劣绅”。庚子事变后,他又呈请兴办工艺学堂,倡导学习近代西方科技和工



艺。后又参与反对英商在长沙开栈贸易、废除粤汉铁路美约等活动,为维护省城安全、收回地方利权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为一名学者,读书、著书、刻书是王先谦一生最大的乐趣。他曾说:“余平生以书为性命”^[1]。学术上,他博涉多通、门庭广大,经、史、诸子、文学等方面都有很高深的造诣,因此有人将他和阮元、钱大昕、王引之、姚鼐等人相提并论,称他为经学家、史学家、诸子学家和文学家。当时也有人将他与王夫之、王文清和王闿运等人一起,并称“湘中四王”。时人或将他与闿运并列,并称“二王”。他诗宗杜甫、苏轼,自成格调,叶德辉更是称其诗品“在湘绮之上”^[2]。他一生著书二十多种,李元度称他“有班、范才”^[3]。刻书也是他毕生致力的事情,经他校勘、整理、编纂和刻印的古今文献多达五十余种,三千二百多卷。而且他所刻印的书籍,大多搜采详备,校勘精审,刻印精良,为晚清刻印之冠,刘锦藻称“维持文献之功,阮氏而后当推先谦矣。”^[4]但是,批评者或讥其“《经解》滥收”、“古文则以桐城、阳湖自封”、考证“徒举物而不详”^[5],或讽以“自为发明者少”、“非著书,乃抄书”等语,又对其学术评价甚低。

一、现当代学界对王先谦的研究

学术界对王先谦的研究,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为界,大体可分前后两个阶段:

民国年间,《清史稿·儒林传》即有王先谦传,简要概述了他的生平与学术,重点谈到他的上书言事,如谏防言路流弊、参揭招商局舞弊、请罢三海工程、弹劾太监李莲英,以及在江苏学政任内和回湘后培养众多人才等情况,并列举了他的部分著作。徐世昌《清儒学案·葵园学案》始把王先谦视为有全国性影响的学者,高度评价道:“同光以还,词曹著述之富,陶冶之宏,称葵园无异词。其督教勤恳,士类至今仍乐道之。虽晚遭奇谤,



顛頤以终，而直节垂声，遗书传世，足动高山之仰，匪止湘学之光焉。”^[6]李肖聃《湘学略·葵园学略》总括了他的学术成就并肯定了他对湖湘学派的贡献：“长沙阁学，季清巨儒，著书满家，门庭广大。予尝论其尊崇经学似仪征阮相国，厘正文章拟桐城姚郎中，校注群史若嘉定钱宫詹，考证诸子如高邮王观察。而考其平生著书，尤有功于楚学。”^[7]他的门人吴庆坻说：“先生于学无所不究，门庭广大，合汉、宋途辙而一之，其于崇经术、治国闻，致力弥笃。”^[8]此外，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等均有王先谦传。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基本上都是浮光掠影式的总体评价，因而显得过于简略，未能具体全面和客观深入地评介他的学术成就和政治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王先谦因被视为政治保守人物而受到批判，学术界对其研究很少，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文化热的出现及持续升温，作为晚清学术大家的王先谦及其著述再次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对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以及晚清学术史的研究不断深入，学界开始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他进行研究，并注意结合时代环境加以考察和对比，研究渐趋细致深入。概括起来，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其政治思想与活动的分析和评判。对王先谦政治方面的研究首先是伴随着戊戌变法史的研究而进行的，因为他在戊戌变法中的活动和态度，历来是学界争议的焦点。史学界最初把他作为维新时期的顽固派来对待，对其自身思想深层次的东西探讨不多。较有代表性的是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该书围绕戊戌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叙述了王先谦戊戌前后的表现及其思想状况，断定“王先谦、叶德辉、苏舆，湖南顽固派之魁首”。^[9]但之后，国外有学者却肯定了王先谦在维新期间的积极表现，将他定性为湖南维新集团中的“温和保守派”^[10]，为重新认识王先谦提供了新的思路。近些年来，大陆学者也开始从不同方面入手，从不同角度对



王先谦进行重新认识。如董剑平从文化心态的角度进行剖析,指出王先谦在维新初期“是一位倾心相助的活跃人物,他推广《时务报》,筹建时务学堂,赞成成立南学会和创办《湘报》,同时创建各类新式企业”,且“赞成废除八股取士,改革科举制度”。认为他后来激烈反对维新派,原因在于“维新派的民权平等之说,蔑视了他深层文化心理中的儒家经典所确定的纲常伦理的权威”。^[11] 邝兆江认为王先谦处于维新与保守之间的中间地段,并探究了王先谦在维新前后态度变化的原因^[12];邱涛《1895—1899年王先谦行年事迹考辨》通过认真梳理了这一时段的史料,对王先谦在这一时段的表现进行了考察,认为其既不属于“顽固派”,也不属于“洋务派”或“维新派”,而是带有明显实用性特征的“绅商”^[13];蔡乐苏等人则将王先谦视为介于激进维新派和顽固守旧派之间的中间势力,认为“像王先谦、张祖同等一批失意人士逐渐融入守旧派行列”。^[14] 这一分析,注意到了王先谦在维新期间的前后变化,从人事、权力之争入手,分析了他由参与支持维新到走向对立面的原因。此外,吴荣政对王先谦的一生作了纵向的全方位的考察,认为“他政治上可以肯定的是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同时也指出其爱国思想的局限性,即“始终停留在封建的水平上”^[15]。这些研究,剖析了王先谦反对维新派的深层次原因,分析更全面客观,对其评判也渐趋理性。

(二)对其学术思想和成就的研究与评价。当代对王先谦的学术评价,以张舜徽先生为较早。他在《清儒学记》一书中,认为“先谦功力,终在文辞,朴学非其所长”,对其所编撰群书,除了《尚书孔传参正》、《汉书补注》、《荀子集解》、《续古文辞类纂》稍加肯定外,指出“其它虽多,自可不作。徒以贪多务博,很想掩有众长,而力不足以相副,论者惜之”。但另一方面,又肯定他治学“门庭广大,博洽多通,根柢雄厚,实非泛泛涉猎者比。观其《文集》中所载诸家叙录,于学术源流,经说得失,辨析至明,知其了然于治学门径,谆谆以劝学为亟,对于湖湘后劲,尤有拥彗清道之功,自是清末一大学者,影响至为深远”。^[16] 稍后,梅季先生也对其学术成就进行总



结,将其学术思想概括为汉宋同途、古今共辙、诸子并蓄、中西兼容,将考据之学与经世之学融为一体、将江浙学派与湖湘学派冶为一炉,推崇其“在清末能戛戛独造,成为一代杰出学人”。^[17]其后,吴荣政的《王先谦的治学风貌》又对其学术方法和成就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 and 总结,指出锲而不舍、虚心请教、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使他最终成为一代著述名家。朱汉民等人认为“王先谦是晚清一位重要的汉学大师。受道光以后晚清湖湘汉学之风和督学江南时江浙考据学派的影响,王先谦的治学呈现明显的汉学倾向;在湖湘理学传统和晚清经世思潮的影响下,王先谦的汉学又不同于传统的乾嘉汉学,已走出纯粹的考据而呈现出既趋重经史考据,又能调和汉宋、兼采古今、求实致用的多途取向”。^[18]此外,还有专门谈论王先谦学术思想的,如陈鹏鸣《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近代前卷)》中有专节谈论王先谦的史学思想,书中将其史学思想概括为“综古今之变”,且认为他的史学中含有追求富强的爱国主义思想,其治学的目的是“扶世翼教”。^[19]

也有不少学者对他的著述,主要是几部经学和史学进行了个案研究。经学方面,主要集中在《诗三家义集疏》上。如张启成肯定是书在《诗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积极作用,但也指出“有偏袒三家诗的总体倾向”,而且“过于注意三家诗与毛诗的差异与对立,过于强调齐、鲁、韩三家诗的同一性”^[20]。邹凤礼《〈诗三家义集疏〉述评》、赵茂林《王先谦与陈乔枏三家〈诗〉研究比较》等文章中也指出了王先谦在诗经学研究上的创新与突破。小学方面,如李传书《清人对〈释名〉的整理与研究》,魏宇文、王彦坤《〈释名疏证补〉的“先谦曰”探微》等文章,肯定王先谦的《释名疏证补》是清代《释名》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史学方面,他的史学著述《汉书补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陈直《汉书新证》、杨树达《汉书窥管》纠正了不少《补注》中的错误;李廷先《王先谦〈汉书补注〉质疑》对《汉书补注》的一些内容提出了质疑^[21];吴荣政《王先谦〈汉书补注〉略论》分析了王先谦补注《汉书》的主客观条件,以及《补注》的内容、优点及其在学术上的影响,认为



《补注》“实为目前《汉书》注解最完备之本”^[22]；李家骥《王先谦〈汉书补注〉评述》认为《汉书补注》“总结了清儒对《汉书》的考据成果”，同时也指出其中贯穿着王先谦“阴阳五行学说及封建伦理的卫道观点”^[23]。马固刚的《〈汉书补注〉训诂杂识》则从训诂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王先谦《汉书补注》是《汉书》诸多注释中的集大成之作，在训诂史上的地位不容置疑”。^[24]桂遵义、袁英光《中国近代史学史》中，将王先谦的史学专辟一节，重点论述了《日本源流考》、《汉书补注》和《后汉书集解》三部史著。作者肯定了《汉书补注》和《后汉书集解》在史实诠释、名物制度考订和文字校勘等方面的成就，但把王先谦的史学定位为封建地主阶级正统主义史学，认为其目的“是想利用古史资料和考据学作为坚守封建宗法思想的阵地的手段，为其地主阶级顽固派的政治服务”。^[25]作者认为《日本源流考》“不仅贯穿着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封建正统主义政治观点和历史观点，而且在史料上东拼西凑而成，在史料上亦无多大参考价值”。^[26]此外，吴荣政撰有《王先谦与〈东华录〉——兼论王录与蒋录、潘录和〈清实录〉的异同》一文，认为王录不只是蒋录、潘录的扩充与续补之作，而是“晚清经世学风影响下出现的皇皇巨制”，“在今天仍不失为一部有用之书”^[27]。钟凤年《评我所见的各本〈水经注〉》通过比较，认为《合校〈水经注〉》是“较善之本”。^[28]

(三)对其教育思想与成就的研究。王先谦从39岁任国子监祭酒开始，到出任江苏学政，直到辞官回湘主讲思贤讲舍及城南、岳麓两书院，从事教育工作近30年，也颇有建树。张舜徽先生评价其教育成就时说：“所至提倡文教，设局刻书；又乐育英才，充实书院；以朴学勸励多士。”^[29]孙海林也指出王先谦“虽为官多年，但教育实践贯通一生；虽政治上保守，但教育思想与时俱进”^[30]，对他的倡实学、务新学、主张发展实业教育等给予了首肯。张庆雄则分析了王先谦教育思想的三个转变，即教育内容上从经古之学到中西融合，教育举措上从设局刻书到废科举，教育目的上从“通经为世用”到“本末兼赅”；评价王先谦的教育思想是以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为主线，企图折中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从而达到道器兼举、